



唐以后关中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原因再探讨

徐卫民

摘要:关中地区是十三朝古都所在地,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朝代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然而唐代以后其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且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政治中心向东向南发展,再没有回到关中地区。从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分析,可发现其衰落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朝代更迭的频繁、经济中心的南移及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等多方面原因综合造成的。

关键词:唐代;政治中心;探讨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0)01-0088-07

关中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朝代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作为都城所在地的时间超过1000年,建都于此的王朝有十三个,即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末、西晋末、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为关中地区留下了不胜枚举的文化遗存。正因为如此,西安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古都。然而,唐代以后的关中却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从此一蹶不振,不再辉煌。那么,为什么唐代以后关中地区会丧失首都的地位呢?对此,学术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过去曾撰文认为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原因^{[1]134-140},经过近几年的再思考,认为其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元的。

一、自然环境的恶化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很早就认识到地理自然环境对都城建设的重要性。《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其意为国都的选择要考虑到用水的便利与否及周

围的自然环境。

从自然环境条件优劣来分析政权的兴衰,在古代史书中多有记载。《史记》载,汉初刘邦对建立都城于何处曾犹豫过,先打算建都洛阳,刘敬认为:“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2]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3716}听了刘敬对关中自然环境的分析后,刘邦即日决定都长安。

自然环境包括地形、水环境、土壤、植被、气候等。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在唐代以前可称之为“天时地利”。《荀子·强国》中指出,关中地区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

关中的土壤质量在当时是全国最好的,《尚书·禹贡》中把全国划分为九州,关中属雍州,在九州中的土壤质量是上上等,“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在西安附近有很多高而平的原区,如著名的白鹿原、铜人原、细柳原、神禾原等。多

收稿日期:2019-04-26

作者简介:徐卫民,男,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西安 710075),兼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秦汉史、历史地理研究。

样的地形、丰富的物产为关中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苏秦谈到关中“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3]《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78。张良也云:“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2]卷五五《留侯世家》,2044

然而由于长期作为都城所在地,关中的自然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环境状况是每况愈下。其原因既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而且人为原因的影响大于自然原因。由于关中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对关中的开发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昔日的优美环境不复存在。

既然关中是十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势必有多的人口集中在这一地区。关中是当时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秦时多次征调外地人口以充实关中地区,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2]卷六《秦始皇本纪》,239。汉王朝也多次征调全国各地的富商大户以充实关中地区。据葛剑雄先生统计,西汉一代从关东徙入关中的累计人口近30万,而至西汉末年,在关中的关东移民后裔已有约121.6万,几乎占当时三辅人口的一半。到西汉中期以后,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关中本地粮食生产所能负担的极限。唐时,关中的人口更多,仅唐长安城的人口已经达到了约100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因此关中地区的人口比例远远大于全国其他地区。

为了解决更多人的吃粮问题,就必须扩大耕地面积、种植粮食,这就必然导致对森林和植被的破坏,致使水土流失。随之而来的就是河流中含泥沙量的增大,从而造成一系列的后遗症。在汉唐时期,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已不能满足关中的需求,与此同时,渭河因为泥沙淤积的原因,漕运也出现了问题,供不应求。渭河是黄河上最大的支流,环绕长安的诸水都是渭河的支流。这些河流水量的减少以及周边植被的破坏直接影响到作为都城供给线的渭河漕运。西汉时由关东运输来的粮食,可以直抵长安城下。之后隋、唐又历次开凿傍渭水而东的人工漕渠,说明单凭渭水已经不能完全满足运输的需要,必须借助漕渠。

过度的农业垦殖不仅造成土地肥力下降,而且造成森林植被面积缩小,必然带来自然生态的失衡。“唐中期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就明显趋向恶化,黄土丘陵山原地区的水土流失也严重起来,致使耕地贫瘠、沟壑增加,河水中泥沙含量加大,也变得混浊。”^[4]

与此同时关中地区长期作为政治中心,则势必要营造大型都城及离宫别馆,还要修建大型帝王陵墓等,这些建筑也必然带来对森林的大量砍伐。中国古代的宫殿均为土木结构,因此木材用量特别大。秦人好大喜功,都城咸阳规模宏大,横跨渭水南北两岸,仅在咸阳周围的离宫别馆就达270余座,“东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离宫别馆相望联属,木衣绋绣,土被朱紫,宫人不移,乐不改悬,穷年忘归,犹不能遍”^[5]25。当时“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2]卷六《秦始皇本纪》,239。西汉时期的宫室建筑比之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长安城内建筑比比皆是,宏伟高大。而修建秦始皇陵所用木材,“其总数恐将达数万立方米”^[6]。《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研究指出,秦兵马俑坑上全用棚木覆盖,二号坑现清理出的棚木有约1310根,大多是圆木,以松木为主,直径多在30—40厘米,长度一般在4米左右,最粗的一根直径达61厘米,最长的一根约12米。雍城的秦公一号大墓“椁体像一座巨大的平顶木屋,主椁有三层,用巨形木套接,椁木为松木,用长短方木两千根以上”^[7]。秦汉时期陵墓建筑实行“事死如事生”的制度,地下宫殿如生前建筑,当时盛行的“黄肠题凑”墓,地宫要用很多木材,不仅雍城秦公大墓如此,秦的东陵、秦始皇陵也是一样,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了汉代,“黄肠题凑”的形制规模更大,耗费的木材更多。十一座西汉帝王陵加上数不清的陪葬墓,都要用掉大量的木材。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感到“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8]247。《潜夫论·浮侈》在批判厚葬之俗时,也涉及陵墓对山林的破坏。

唐天宝二年(743年),京兆尹韩相宗修造的从今长安韦曲西南向渭水西北流的漕渠,就是为了运输终南山中的木材。白居易在《卖炭翁》中亦言:“伐薪烧炭南山中。”这种以木材作燃料的办法,必然会造成对森林的大量破坏。据研

究,即使按50万人计算,唐长安城生活薪柴消耗量,每人平均每日最少消耗0.5公斤,则长安城一年要消耗91250吨薪柴。如果每株可用薪柴的中等树木按100公斤(干燥)计算,平均每年长安城的薪柴消耗量达到912500株成材树木,大约1平方公里的森林^[9]。

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反之则会造成负面影响。唐中期以后,关中地区的气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失去了先前的温暖湿润的气候,从而影响了农业的生产。朱士光等先生认为,唐德宗贞元以前的7世纪至8世纪,气候以暖冬为主,气温偏高。而在唐代后期,即贞元以后的9世纪,则以寒冬为主,也有春、秋出现霜雪害稼的现象。这种相对寒冷气候一直延续到了五代时期^[10]。学界大多认为,唐代中后期气温开始变冷,这对于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关中地区经济来讲无疑是不利的。

北宋时,关中地区气候继续偏冷,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关中中部京兆府出现了“大雪杀苗稼”的现象。当时关中的梅树已绝迹,旱灾频繁出现,反映出气候的明显变化。曾有“八水绕长安”美誉的西安水系,在唐代以后也由于水环境的恶化遭到灭顶之灾。河流的水量大为减少乃至干涸,水土流失也十分严重,这与秦岭及关中北部山系森林植被的破坏有一定的关系。这种情况导致了长安曾经的环境优势已不复存在,从而影响了长安政治经济的发展,其地位逐渐下降。由于气候与植被的变化,导致关中的河流在唐代以后水量大大减少,严重影响了关中的生态环境,并造成渭河漕运的中断。由于植被的减少,关中河渠的水位也在不断降低。史念海先生认为西安周围诸河的流量显著减少,“促成这样的变化和旱暵灾害以及地震等皆无任何关系,唯一的原因乃是由于秦岭山上森林的破坏”^[11]。

长安周边河渠水量的逐年减少对于长安的政治中心地位产生了巨大影响。表现在,其一,河渠水量减少使得长安地区旱灾严重,直接影响到关中的农业生产,“贞元元年春,旱,无麦苗,至于八月,旱甚,灞浐将竭,井皆无水。六年春,关辅大旱,无麦苗”^[12]卷三五《五行志》,917。其二,关中的漕运受到极大限制。长安作为都城,人口

众多,粮食的消耗特别大,因此必须靠漕运来维持,而河流水量的缺乏必然影响漕运,一旦漕运有问题,影响巨大。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邪!’乃止”^[13]卷二〇九,6639。正因为关中饥荒,唐代皇帝经常东巡洛阳以避关中粮荒,高宗时发生了三次“天子逐粮”的事件,之后的几位皇帝就曾因长安没有粮食而不得不移至洛阳办公,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逐粮天子”。连皇帝都受粮荒影响,老百姓更无从谈起。

周秦汉隋唐等都建都关中,使这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对关中周边也进行了大力开发,对西北和北部的开发,使陕北和鄂尔多斯一带成为胜似关中的“新秦中”,也使河西走廊地区得到了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关中的粮食问题,但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比较脆弱,因而对自然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

二、频繁地改朝换代对关中带来了众多负面影响

改朝换代在中国古代好比走马灯,每个王朝的灭亡,多是因为战争,或是统治阶级之间的宫廷斗争,而且多是围绕关中这个政治中心进行,这些都对社会与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秦朝末年项羽入关后,“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火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无疑对当时的环境是极大的破坏。又如新莽末年,更始军和赤眉军相继攻入长安,城市宫室遭到很大破坏。两汉之间的战乱使长安和关中的破坏尤为惨重,死者数十万,导致“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14]卷九下《王莽传》,4193。再如东汉末年汉献帝迁都长安后不久,董卓被杀,董卓部将李傕、郭汜、樊稠攻入长安,后又相互攻杀,“是时,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15]卷六一,1969。长安遭到比西汉末年更大的破坏。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攻破潼关,关中沦陷一年零三个月,关中人民陷入了沉重的灾难之中,昔日繁华的大唐国都成为动荡之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臻强大,兼以外患相继,战祸纷至。遂发生了“泾师之变”、唐“勤王”兵对黄巢起义军的围剿、同州沙苑之战、岐军攻克长安、梁军包围凤翔以及朱温对长安的劫掠等战乱事件。经过屡次破坏后,长安变成了韦庄笔下《秦妇吟》中的“昔日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关中到处“人烟断绝,荆榛蔽野”^[15]《秦宗权传》,5398。李商隐从梁州到长安路过京西郊畿时,写下《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高田长榭枿,下田长荆榛。农具弃道旁,饥牛死空墩。依依过村落,十室无一存。存者皆面啼,无衣可匝宾。”杜甫在华州目睹战后关中的残破,在《夏日叹》中悲叹地写道:“万人尚流冗,举目唯蒿莱。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无谐。”关中地区“土无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蚕不事,举先王尽力沟洫之良田,听命于旱蝗,而不思捍救,仍饥相迫”^[16]卷二三《肃宗》,790。甚至在唐代宗时,曾因关中“田野空虚,恐粮食不足,国用有阙”^[15]《郭子仪传》,3458,而欲迁都。

唐代长安城的宫室遭到多次大的破坏,宫室俱焚。“(李克用)逼京师,令孜计穷,乃焚坊市,劫帝夜启开远门出奔。自贼破长安,火宫室、舍庐十七,后京兆王徽葺复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荣反。’命火宫城,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12]卷二〇八《列传》,5887。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年),朱温胁迫昭宗迁都洛阳,行前不仅“强令京师民按户籍迁居洛阳”,而且下令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公廨、民间房屋,将所得木料由渭水漂流而下运往洛阳,从而使长安城再一次遭受了致命的打击,成为一片废墟。后来宋明王朝虽然曾有迁都西安的打算,都因为种种原因而未如如愿。

三、经济重心的南移

秦汉时期的国家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叠,但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翘楚。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关中之

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卷一二九《货殖列传》,3262。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禹贡》中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扬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扬一益二”。与之相反的是,北方经济却因战乱频频而有所倒退。

究其根本,是由于东汉以降,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随着频繁的战乱,大量的北方人口避难于南方,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力,大大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在关中及北方经济遭到重大破坏的同时,南方地区的经济却稳步发展起来。安史之乱后,南方的经济开始超过北方,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南方经济之所以后来超过北方,其原因大体可归纳为五点:一是南方地区本身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水资源丰富,在人类对大自然改造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二是北方战乱的同时,南方则处于偏安地区,社会稳定,大批具有先进生产技术的人员迁往南方,他们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三是南方的几个封建政权重视经济的开发,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如三国时期的蜀、吴,东晋,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等;四是南方的水陆交通发达,利于货物的交流;五是中国古代气候从东汉开始逐渐变冷,南方的气候比北方更适合人类的生活和农业的发展。

东汉末年由于政局混乱和匈奴入侵,汉民族开始大规模迁徙,同时南方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南方水环境好,河川密布,水上运输便利,水利建设的成效高,对于经济开发和文化发展都有重要的作用。三国鼎立时期,南方出现吴、蜀两个政权,吴国和蜀国要维持军队的需要并收容北方来的人口,必须加强土地开发,这对于南方较大规模的开发确实有推动作用。晋代的永嘉之乱和后来的晋室南迁,对南方的经济影响较大,关中及北方的人口为了避乱,不得不到南方地区从事生产,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在水利条件较好的土地上生产,对南方地区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史载:“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

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无能比也。”^[17]列传第十四《孔季恭 羊玄保 沈庆庆》,1540 安史之乱以后,迁往南方的人口更多,这些客家人与土著民一起,共同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

南方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标志是人口的大量增加。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减,而南方人口大增。如苏州增加了48%,鄂州增加了100%,洪州增加了64%,饶州增加了228%,襄州增加了194%。其中有不少是从北方迁来的,苏州从北方迁来的户口达三分之一,据《元和郡县图志》统计,安史之乱后,全国四万户以上的府州共15个,其中江南道9个,剑南、岭南道各1个,而北方只有京兆府和太原府,全国平均千户以上的县共164个,南方的江南、岭南、剑南道达111个,而关东、河南、河东道只有39个^[18]。南方人口的增加导致新置大量州、县,江南、剑南、岭南三道新增州42个、县185个。从西晋末年至宋代,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南大规模移民的浪潮,即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其中第一次移民从北方迁往南方的大约有90万,第二次约为650万,第三次约为100万^[19]。

南方地区由于土地的垦辟和水利的兴修,农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湖南江西诸州“出米至多,丰熟之时(际),价亦极贱”^[20]卷七二《乾符二年南效赦》,403。因而当时重臣权德舆指出:“江淮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12]卷一六五《权德舆传》,5076

唐时南方的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兴起了许多城市,如扬州、益州、广州、杭州、福州、泉州、苏州、湖州等,这些在当时都是繁华的商业城市。隋时,建康城已“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二京指长安和洛阳,可以想见当时的建康已具有一定的城市规模。唐朝时已有“扬一益二”的美称,扬州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为东南水陆交通枢纽,“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此为咽喉”^[21]卷四九六,5055。当地“商贾如织”,百货所集,“雄冠天下”,四方交易,“动辄百万”。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15]卷一三十二《秦彦传》。是中

外富商巨贾的荟萃之地。当时的杭州据唐代李华的《杭州刺史厅壁记》记载:“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骈槁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当时的成都在晚唐时人卢求《成都记·序》中记载:“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其要妙。扬(州)不足侔其半。”《论岭南请于安南置市舶中使状》描写到,在沿海地区,福建的泉州、浙江的明州开始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更是“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21]卷四七三《陆宣公文集》,4828。“蛮胡贾人,舶交海中,……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22]卷二一《送郑尚书序》,378。外商云集者很多,并特划定一区,以留居外商,时称“蕃坊”,设有“蕃长”,管理外商事宜。

唐以前长安的外来粮食大多依靠农业发达的关东地区,当经济重心南移以后,再要从南方运粮既增加了难度,也增加了成本,实在是得不偿失。由于关中地区经济的不景气,解决粮食及物资的运输问题便成为唐王朝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唐王朝为了转运东南的财赋,特设盐铁运使官职专门负责漕运。唐玄宗时北运漕粮已达400万石,据唐宪宗时期的李肇所撰《国史补》卷下记载:“凡东南邑郡,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转运使岁运米二百万石输关中,皆自通济渠入河而至也。”安史之乱后,关东地区的粮食更已无法保证唐朝廷的需要。大部分粮食要依靠从南方运来。早在安史之乱爆发初期,第五琦就曾向唐玄宗奏言:“方今之急在兵,兵之强弱在赋,赋之所出江淮居多。”^[15]卷一二三《第五琦传》,3517 唐宪宗更明确指出:“天宝之后,戎事方殷,两河宿兵,户赋不加,军国费用,取资江淮。”^[21]卷六三《元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册号赦》,677 韩愈更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十九。”^[21]卷五五五《送陆歙州诗序》,5612 以至于形成“当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的局势^[23]卷十六,因而漕运的中断直接威胁到都城长安的生存。

在古代社会,水路运输最为经济和方便,因而漕运显得尤为重要,但水运并非一帆风顺,颇费周折,唐前期从关东运输粮食与物资还不算太远,但是随着藩镇割据及北方经济的衰落,只有从东南运输,困难就更大了。要经过许多关口,距离太远,因而运输耗费的时间更长。当时

的宣州刺史裴耀卿上奏云：“缘水路遥远，转运艰辛，功力虽劳，仓储不益。窃见每州所送租及庸调等，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已有阻碍，须留一月已上。至四月已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停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干浅，船艘隘闹，般载停滞，备极艰辛。计从江南至东都，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皆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费。”^[15]《食货志》，2114《新唐书·食货志》也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12]《食货志》，1365 特别当遇到唐朝末年藩镇割据那样人为的阻拦运输，其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五代、北宋时期便把都城建在水路交通发达的开封，从此以后国家的政治中心再也没有建在关中地区了。

四、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除了以上三方面原因以外，唐朝以后，由于多方面原因的影响，陆上丝绸之路迅速衰落，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进一步被削弱。

周秦汉唐时期关中的繁荣发展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有着密切关联。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商业贸易之路，也是世界上路线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化交流互鉴之路。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使者张骞从长安出发，出使大月氏。13年中，历尽艰辛，其足迹踏遍天山南北和中亚、西亚各地。之后无数商贾、旅人沿着张骞的足迹，穿越驼铃叮当的沙漠、炊烟袅袅的草原、飞沙走石的戈壁来往于各国之间，带来了印度、阿拉伯、波斯和欧洲诸国的玻璃、红酒、马匹等商品，带走了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等，增进了相互了解，推动了宗教、科技和艺术的交流，促进了共同发展。汉使者、商人接踵西行，大量丝帛锦绣外运。西域地区通使汉廷络绎不绝，各国商队也将各自的

珍奇异物运至长安，汉长安城遂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商贸大都会。

当时的汉长安城中设立鸿胪寺专门管理外交事务；设立蛮夷邸，作为专门接待边疆民族及外国使者的场所，是汉代对八京四夷藩客接待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长安未央宫北的藁街设立各国使节的使馆区，一些到汉长安城的宾客、君长往往被安置在长安城南郊上林苑中的葡萄宫、平乐观等，当时的上林苑中还专门设有乌孙语学校。

隋唐长安城规模浩大、气势恢弘、布局整齐，面积达84平方公里，加上周边地区人口达百万之众，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盛，长安成为交通繁忙、宾客辐辏、商业繁荣的国际性城市。唐长安城声威显赫，国威传播四方，对于异域文明兼收并蓄。随着丝绸之路交往频繁，外国人华者甚众，来唐代长安留学、做官成为时髦。唐代长安因此成为彼时中华文化与异域文化交融之地，是为古代丝绸之路开放交往的典范。唐代的长安城可谓国际大都会。唐长安城中的东西二市是当时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节点，各有二百二十行。据日僧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24]⁴²¹。可见东市之盛。但西市较之东市更为繁盛。西市是胡商聚集的国际贸易市场，故又有“金市”之称。

汉文化、汉学、唐文明等之所以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轰动，被世界所了解、所崇敬，与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必然的联系。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由此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富庶繁华甲天下。然而唐以后，由于中国民族关系和国防形势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迫使各个王朝不得不把政治中心向东迁移。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和东北而来。因此东方的国防压力增大，经济、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放于关中，显然是不行的。于是都城由西向东，先到开封，后到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东迁和造船业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显得越来越重要，陆上丝绸之路越来越不景气。关中地区逐渐失去了与外界交流互鉴的机会。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唐代以后关中地区失

去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是因为自然环境的恶化、朝代更迭的频繁,经济中心的南移、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参考文献

- [1]徐卫民.唐以后西安失去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原因[M]//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4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3]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朱士光.汉唐长安城兴衰对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1):77-82.
- [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6]袁仲一.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徭役[M]//秦俑学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 [7]白建钢.秦公陵墓之谜[N].光明日报,1986-07-13(3).
- [8]马非百.盐铁论简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9]张小明,樊志民.生态视野下长安都城地位的丧失[J].中国农史,2007(3):29-37.

- [10]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贵.历史时期关中地区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J].第四纪研究,1998(1):1-11.
- [11]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
-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司马光.资治通鉴[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5]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6]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7]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8]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19]邹逸麟.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44-45.
- [20]宋敏求.唐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1]董诰等.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22]韩愈.韩昌黎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 [23]杜牧.樊川文集[M].陈允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4]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A Re-Discussion about Why Guanzhong Region Lost Its National Political Center Position after the Tang Dynasty

Xu Weimin

Abstract: Guanzhong region is the seat of the ancient capital of 13 dynasties, which is the region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of capital establishment, the most dynasties and the greatest influence i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after the Tang dynasty, it lost its status as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whole country, and was unable to recover after a setback. China's political center developed eastward and southward, and never returned to Guanzhong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root cause of its decline is the deterioration of natural environment, frequent changes of dynasties, the southward shift of economic center and the decline of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Tang dynasty; political center; discussion

[责任编辑/云 扬]